

“跳梁小丑!”前中校对他喝斥道,这时成了军管会的红人,担任清理阶级队小组的副组长,正职当然由现役军人担任。

你其实就是个蹦蹦跳跳的小丑,这全面专政无边的簸箩里不由自主弹跳起不已的一粒豆,跳不出这簸箩,又不甘心被碾碎。

你还不能不欢迎军人管制,恰如你不能不参加欢呼毛的一次又一次最新指示的游行。这些指示总是由电台在晚间新闻中发表。等写好标语牌,把人聚集齐,列队出发上了大街,通常就到半夜了。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一队队人马从长安街西边过来,一队队从东头过去,互相游给彼此看,还得振奋精神,不能让人看出你心神不安。

你无疑就是小丑,否则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也是毛老人家界定的人民与敌人的警句。在狗屎与小丑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下,你选择小丑。你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也得像名士兵,在每个办公室墙上正中挂的最高统帅像前并腿肃立,手持红塑料皮《语录》,三呼万岁,这都是军队管制之后每天上、下班时必不可少的仪式,分别称之为“早请示”和“晚汇报”。

这种时候你可注意啦,不可以笑!否则后果便不堪设想,要不准备当反革命或指望将来成为烈士的话。前中校说的并不错,他还就是小丑,而且还不肯笑,能笑的只是你现如今回顾当时,可也还笑不出来。

他作为军人管制下的清查小组里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被他这派群众和干部推举出来之时,就明白他末日到了。可他这一派的群众和干部居然指望他来支撑,又哪知道凭他的档案中他父亲“私藏枪支”这一条,就可以把他从这革命大家庭里清除掉。

清查小组的会议上,张代表念了一份“内控”也即内部控制使用人员的名单。他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吃了一惊,这“内控”不仅对一般职工而言,也包括某些党内干部,清查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首先拿他们开刀。这就不是两年前红卫兵的暴力,也不是群众组织间派别的武斗,如今从容不迫,在军人指挥下像部署作战方案一样,有计划,有步骤,分批打击。人事档案军管会启封了,有问题的人的材料都堆在张代表面前。

“在座的都是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代表,我希望同志们消除资产阶级的派性,把混在你们组织中的坏人都清理出来。我们只允许有一个立场,那就是无产阶级立场,不许有派别的立场!大家按人头进行讨论,敲定哪些个放到第一批,哪些个放到第二批。当然还有第三批,那就看是不是主动认罪,交代和揭发表现如何,再确定是从宽还是从严处理!”

张代表阔脸方腮,扫视在座的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一眼,一把粗大的手指在那一大叠的卷宗上戳了戳,随后掀开茶杯盖子,喝茶抽烟。

他小心翼翼提了几个问题,也因为军代表讲了可以讨论,他问他的老上级处长老刘除了

家庭出身地主，是否还有别的问题？再就是一位女科长，当年的地下党员，学生运动背后的组织者，就他这一派调查的结果，从未被捕过，也无叛党投敌的嫌疑，不知为什么也列入专案审查？张代表把头转向他，抬起夹着烟卷的两只手指，望着他没说话。前中校就是这时候对他斥责道：“跳梁小丑！”

几十年后，你看到逐渐披露的中共党内斗争的若干回忆，毛泽东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手下稍有异议的将帅们大概就是这样望着，照样抽烟喝茶，便会有别的将帅起来斥责，用不着老人家多话。

你当然够不上将帅，那位前中校还冲你说：“一个小爬虫！”

是的，你不过是小而又小的一只虫，这条蚁命又算得了什么？

下班的时候，他在楼下车棚子里取车，碰见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梁钦，他造反后两年多那份工作都是梁接了过去，这造反生涯也该结束了。他见边上没人，对梁说：“你先走一步，过了前面的十字路口，慢骑，有话同你说。”

梁骑上车走了，他随后撵上。

“上我家喝一杯去，”梁说。

“你家有谁？”他问。

“老婆和儿子呀！”

“不方便，就这么边骑边说吧。”

“出了什么事了？”梁想到的就是出事。

“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他没望梁，仿佛不经意问了一句。

“没有呀！”梁差一点从车上跌下来。

“有没有同国外的联系？”

“我国外没亲属呀！”

“给没给国外写过什么信？”

“慢点！让我想想……”

又一个红灯亮了，他们都脚着地，停住车。

“有这事，组织上问过，都好多年前啦……”梁说着就要哭了。

“别哭，别哭！这在大街上呢……”他说。

这会儿绿灯了，车流前涌。

“你对我直说吧，我不会连累你的！”梁止住了。

“说是你有特嫌，当心就是了。”

“哪儿的话！”

他说他也不清楚。

“我倒是写过一封信到香港，我的一个邻居，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一个姑妈把他接到香港去了。我倒是写过封信，托他替我买本英文俚语字典，就这事，都哪八辈子的事了！还是朝鲜打仗，我大学刚毕业，参军在战俘营当翻译……”

“这字典你收到没有？”他问。

“没有呀!那就是说……这信没寄出?扣下了?”梁追问。

“谁知道?”

“怀疑我……里通外国?”

“这可是你说的。”

“我也怀疑我?”梁偏过头，问。

“那就不同你说了。当心!”

一辆长长的两节的无轨点电车擦边而过，梁把手一歪，差点碰上。

“怪不得把我弄出了部队……”梁恍然大悟。

“这还事小呢。”

“还有什么?都说了，我不会把你兜出来的，打死都不会!”梁的车笼头又打弯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他警告道。

“我不会自杀的，做那蠢事!我还有老婆和儿子!”

“好自为重吧!”

他车拐弯了，没说的是梁列在清查的第二批名单里。

多少年后，多少年?十多年……不，二十八年后，在香港，酒店房间里你接到个电话，对方说是梁钦，从报纸上看到在演你的戏。这名字你一时反应不过来，以为是什么场合见过一两面的哪位朋友，想看戏弄不到票，连忙说对不起，戏已演完了。他说他是你的老同事呀!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你说你明天一早的飞机，实在没时间了，下回吧。他说那他马上驱车来酒店看你，你不好再推托，放下电话，这才想起是他，你们最后那次骑车在街上的谈话。

半个小时后，他进到你房里，西服革履，细亚麻衬衫，一条色调青灰的领带，不像大陆的暴发户那么扎眼，握手时也没见劳力士金表和金灿灿的粗手链或大金戒指，头发倒乌黑，以他这年纪显然染过了。他说，来香港定居多年了，就是他当年写信托买字典的那少年时的好友，知道他为那么封信吃了大苦，过意不去，把他办出来了。他现在自己开公司妻儿移居加拿大，买的护照。他对你大可实说：“这些年挣了些钱，不算大富，稳稳当当度个晚年没问题，儿子又有了个加拿大的博士文凭，不愁什么了，我是两边飞，这香港要混不下去，说撤就撤了。”还说，他感激你当时那句话。

“什么话?”你倒不记不得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要不是你那句话，那势头哪顶得下来?”

“我父亲就没顶下来，”你说。

“自杀了?”他问。

“幸亏一个老邻居发现了，叫了救护车，送进医院救过来了，又弄去农村劳改了几年，刚平反还不到三个月，就发病死了。”

“你当时怎么不提醒他一下?”梁问。

“那时哪还敢写信?信要查到的话，我这命没准也搭进去了。”

“倒也是，可他有什么问题?”

“说说看，你又有有什么问题?”

“甭说了，嗨！”他叹了口气。停了会又问：“你生活怎样？”

“什么怎样？”

“我不是问别的，你现在是作家，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经济上，你明白……我这意思？”他语气犹豫。

“明白，”你说，“还过得去。”

“在西方靠写作为生很不容易，这我知道，更别说中国人了，这不像做买卖。”

“自由，”你说你要的是这自由，“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他点点头，又鼓起勇气说：“你要是……我就直说吧，手头上一时有困难，周转不开，你就开口，我不是什么大老板，可……”

“大老板也不说这话，”你笑了，“他们捐点钱，办上个什么希望工程啦，好同祖国做更大的买卖。”

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在上面添上个地址和电话，递给你说：“这是我的手提电话，房子是我买下的，加拿大的那地址也不会变。”

你说谢谢他，目前还没有什么困难，要为挣钱写作的话，也早就搁笔啦。

他有些激动，冒出一句：“你是真正在为中国人写作！”

你说你只为自己写的。

“我懂，我懂，写出来！”他说，“希望你都写出来，真正写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写那些苦难？他走了之后，你自问。

可你已经厌倦了。

你倒是想起你父亲，从农村劳改回来刚平反，恢复了职务和原工资，便坚持退休了，去北京看你这儿子，也打算日后就览散心，安度个晚年。谁知你才陪他逛了一天颐和园，晚上就咳血。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随后诊断是肺癌，已扩散到了晚期。一天夜间，病情突然恶化，住进医院，次日凌晨便咽气了。他生前，你问过他怎么会自杀的？他说当时实在不想活了，没有更多的话。等到他刚能过活而且也想活的时候，却突然死了。

追悼会上，平反了的死者的单位都得开个这样的追悼会，好向家属作个交代。当作家的儿子岂能不讲点话，否则不恭敬的不是儿子对于过世的父亲，而是对不住举办追悼会的死者同志的单位领导。他被推到灵堂的话筒前，又不好在亡父的骨灰盒前推让。他不能说他爸从来没革过命，虽也未反对过革命，不宜称作同志，只好说一句：“我父亲是个软弱的人，愿他在天之灵安息。”要是天堂的话。